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2106001

华中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政策研究

——以淮北、淮南、皖江区为个案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华中抗日根据地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维护国共合作的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一方面主动寻求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政治阴谋,在军事上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华中抗日根据地在争取中间派的工作中,努力实现统一战线政策和群众路线的统一。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在争取伪军工作中,成功运用了“两面派”策略这一特殊的、独创性的统一战线工作方法,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技巧。

关键词:华中抗日根据地;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两面派”策略

中图分类号:K26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6-0001-06

史学界已经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问题有过一定研究。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对统一战线工作这一被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视为“革命法宝”之一的政治策略工具,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作用和实践经验,尚缺乏全面、系统而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现有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的研究尚有几方面不足。首先,对国民党顽固派当局的统一战线工作,现有研究失之宽泛,缺乏结合地方具体社会状况的个案分析和比较研究视角。其实,在各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中,土著势力和外来即客居势力的政治倾向明显不同,因此中共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和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往往成为对国民党当局统一战线成败的关键。换言之,中共作为外来革命者,是否能够使统战工作实现地方化,成为其统战政策成功与否的天然标尺。其次,现有研究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工作,以及相关的敌占区工作,普遍缺乏必要的学术关注。其实,伪军争取工作恰恰是中共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政策中,除对国民党当局统战工作外的又一重点。这其中特别应该关注的是,中共在伪军争取工作中成功实施了革命“两面派”策略。而这一具有高

度政治技巧的独创性的政治斗争手段,却尚未得到应有的学术关注。因此,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笔者选取安徽省境内的三个抗日根据地作为个案,探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境内三个分别由新四军第四师、二师、七师开辟的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地跨长江、淮河流域,控制陇海、津浦线两大铁路干线和大运河,具有关键的战略地位。

一、对国民党顽固派当局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

在三个根据地中,以淮北区政治环境最为复杂险恶。正如淮北区领导人刘瑞龙所分析:淮北区“是苏皖两省的交界,这两省民情风俗、党派关系、封建集团都有不相同的地方”,不仅是“江湖上发源地,洪门青帮都有”,而且各派政治势力犬牙交错,“共产党、国民党都有,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有,抗日人士及汉奸都有”。^{[1]52-53}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空前危机,政治形势骤然紧张。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当局的不断挑衅,淮北区党组织针锋相对地采取既联合又

收稿日期:2021-05-10

作者简介:王明前(1971—),男,江苏苏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治策略,在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战分裂统一战线罪恶行径的同时,军事上寸土必争,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当局的进攻。

1941年1月22日,刘少奇致电彭雪枫等:“坚持津浦路西及陇海路南现有阵地,不让反共军向东向北深入,以确保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及陇海路以南地区,迅速加强建立根据地以便与反共军及敌伪长期坚持斗争起见”。^{[2]43}1943年3月28日,刘少奇指示张爱萍、江华、刘瑞龙:在创建淮北皖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必须坚决打击反共的国民党顽固势力。首先,“须分区扫荡,并且是有步骤有计划的扫荡,如首先打击最顽固的分子,而暂时和缓另外一些顽固分子等”。其次,“必须尽可能的采取比较隐蔽一些的方式,尽可能避免一些国民党方面的交涉借口”,以及“要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去坚决消灭顽固派”。^{[3]76}

随着淮北区的逐渐巩固,淮北区党组织深刻认识到,国民党顽固派当局越来越依靠所谓“土顽”,亦即打着国民党招牌的土著反动势力,作为制造反共摩擦的主要工具。特别是新开辟的泗灵睢区,土顽更是成为抗日民主政权最主要的敌人。

1943年5月22日,刘瑞龙在泗灵睢县委会上,客观分析了作为边缘区的泗灵睢地区复杂的社会生态。他指出:这一地区的所谓“土顽”,客观上成为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挑战。“苏皖两省土顽,在这里都有社会基础,有武装和政权,有很多地方干部,现在已成为苏皖两省土顽和我们斗争的主要力量之一”。这种根深蒂固的地方政治势力,不仅“善于利用敌伪力量,假手敌伪或在政治掩护下,反对和打击我们”,而且“有长期反共的斗争经验”,“和广大群众有最深刻的矛盾”。^{[1]341}尽管环境复杂险恶,但党组织一定要坚信“我们力量的来源便是大多数人民”,要充分认识“友我双方的力量和地位,不可能是永久固定不变的,事实上也不能维持现状,双方都在发展中”的规律,^{[1]348}本着“孤立顽军,削弱顽军,团结一切朋友,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力量和地位”的原则,对土顽“要以团结为主,争取中上层与他们和解,掌握中下层”;“对坚决反共分子,不惜工本坚决的搞掉他,但对不同对象要分别对待,不可千篇一律,争取一部分,孤立一部分,中立一部分,打击一部分”。^{[1]361-362}他进而提出:在国统区,应该“主要采取‘金蝉脱壳’的方式,不是一脚踢开,而是逐渐向里挤,争取他的乡保甲长为我服务,团结地

方绅士,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其中下级干部及其战士,最后实现‘金蝉脱壳’,达到我之统治”。^{[1]356}1943年6月,邓子恢也在淮北高干会上报告指出:今后土顽,首先“仍应本团结宽大方针,在团结过程中,中立其一部分,争取其一部分,而使其最顽固者孤立而趋于消灭”。其次,“在没有反共军东进威胁之时,我们与土顽可实行分疆而治,但不要自己吃亏太大”。再次,“在团结中向我进攻者,不论任何人,我应采取坚决的自卫立场,但应先礼后兵”。最后,“在还击时应查明具体对象,分别打拉”。最重要的是“要以土共对土顽,以据点对据点”,即必须“在建立我们的武装与政权之后以我们的政治设施与土顽对抗,才能使群众脱离土顽,使土顽自趋于消灭”。^{[4]339-340}

淮南抗日根据地也积极寻求与国民党当局合作抗战。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刘少奇、项英等:江北新四军应“注意争取一切国民党与地方绅士之同情者与之建立合作关系,正确掌握统一战线原则”。^{[5]24}

皖江抗日根据地因为总体政治环境不如淮南区安全,军事实力又不如淮北区,因此皖江区与国民党当局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高度重视。1941年8月21日,陈毅、刘少奇致电曾希圣指导皖南工作,指出:“皖南工作基本上应切实坚持完整的统一战线原则,于顽方进攻时则坚决自卫,揭穿亲日派在皖变中进攻新四军的阴谋,宣传新四军军部重建后所获得的抗战伟大胜利”。^{[6]30}

二、争取中间社会阶层的努力

在与国民党顽固派当局的斗争中,中间派的态度十分关键。特别是由于华中地区复杂的社会情况,使得根据地党组织对中间派的争取显得尤其重要。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组织认识到,中间派阶层主要是地主阶级、富农、商人和知识分子,其土著性的特点决定其不可能忠实追随国民党顽固派当局的反共立场,因此存在着被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的现实可能性,有可能参与到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减租减息政策。

皖南事变后,对中间派的争取工作因为其态度在国共双方的摇摆而显得尤其迫切。1943年2月26日,淮北区党委指示:“在民族矛盾为现阶段基本矛盾的大前提之下,对一般地主士绅绝不应忽略其抗战的一面,而坚决积极的去发扬民主

实行法治”。为此应当“认真的正确的执行党的财政、经济法令、土地政策,在政权中的三三制政策,不侵犯人权、财权、地权,不排斥党外人士”;“尊重并保持士绅的地位名誉,不侵犯其尊严,不侮辱其本人及亲属,关心他的安全,保障他的利益,采纳他的正确意见”。在具体实施交友工作时,应注意:首先,统战交友工作“不可一曝十寒,而是耐心的不断的进行,一有机会即便进行,没有机会应当寻找机会”;其次,“要我方代为保守秘密的,便须负责保守秘密”;最后,“要由识面朋友进到知心朋友”,即要做到“既是朋友就应当利害甘苦与共”。^{[7]50-53}1943年3月28日,刘少奇指示张爱萍、江华、刘瑞龙:“要广泛地发展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使中间分子中立,努力团结进步分子,使他们同我们一起与顽固分子斗争”。^{[3]76}

淮北区党组织在开展统战工作时,时刻牢记维护基本群众的根本利益,慎重处理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辩证统一关系。1944年10月,刘瑞龙在总结淮北五年来群众工作时指出:应该本着群众观点来看待统一战线,即“必须了解我们的统一战线的阶级内容不单是几个地主士绅,而主要还是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为骨干的统战”,也就是说统一战线的“力量不仅是军队政权,而特别重要是广大群众”。同时还要了解统一战线中斗争与团结的统一,即“团结中不能没有斗争”。^{[8]90}为此,要确立如下针对地主阶级的方针,即“打击和孤立的对象是个别大地主,争取的对象是中小地主。打击的对象是顽固的地主,争取的对象是开明地主。即使被打击的对象,仍不放弃争取其有利于抗日的这一方面,对地主是削弱其封建剥削,不是消灭其封建剥削;对待经营地主与对待富农的政策一样”。总之,“我们对地主的基本政策是引导他们向经营工商业方面发展,欢迎他们自己参加劳动”。同时,对小土地所有者,要“具体研究其生活情况并具体确定其阶级地位,不能与地主一样对待”。要把富农与地主区别对待,因为“富农自己也参加劳动,但主要的是靠雇佣劳动,这是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因此应“联合富农奖励富农生产,对半地主性的富农,只削弱他封建剥削的一方面,奖励其富农生产的一方面”。在科学分析农村各阶级在农村生产关系的地位的基础上,可确定对各阶级的如下政治态度:除坚决反共、对抗战态度动摇的顽固派之外,

一般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叫他为右派,他们对抗战也动摇,对共产党也有成见,也反对民主,反对改善民生,但没有顽固分子反动得那样积极”,因此“对右派主要是政治上孤立他,个别右派分子,还可以吸取他参加政权”。中间分子,“代表中小地主、中等资产阶级的,开明绅士也包括在内”。其政治态度表现为:“当我们与顽固分子斗争时,他守中立,他没有一定的政治主见”;“一般的赞成抗日,也赞成民主,但对改善民生不满意,他本性是动摇的”。为争取在农村社会中势力很大的中间分子,“一是适当照顾与尊重他们的利益,要好好团结他们;一是要他们执行我们的政策,跟我们走”,所以“必要的斗争还是必需的,但斗争不要超过抗日民主团结这个原则所许可的范围”。^{[8]92-95}因此,在经济利益方面,“不要再提出超出现在政策以外的过高要求了,今后主要以巩固既得利益,从组织群众生产中提高群众的经济生活,在减租减息之后要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反贪污善后要适当处理,奖励地主转入生产劳动,投资发展工商业”。在政治权利方面,“巩固基本取得的政治优势,同时又要保障各抗日民主阶层的人权政权,要切实的实行‘三三制’”。在与中间派的政治较量中,党组织“今后要主动的进行合法斗争”,提高领导和实施民主政治的政治素质,为此要做到“党内要一致,上下要一致”;“要有准备的和人家斗,要多方面搜集材料”,“一方面懂得如何让地主、中间分子畅所欲言,很好团结他们,又要准备对反攻的地主进行适当的合法斗争”;“要懂得争取大多数,孤立少数”;“党员要奉公守法,不要强词夺理,要严格纲纪,自己站稳脚跟”;“对反对者先要有个正确的态度,民主说理的态度”。^{[8]104-106}

中间派争取工作的难点在边缘区。这需要淮北区党组织通过高超的政治斗争技巧来加以解决。1943年5月22日,刘瑞龙在泗灵睢县委会上科学分析了泗灵睢地区中间派的动态。他指出:由于“境内土地分散不集中,地方上独立分散的小领袖很多,没有统一全局的大人物,大地主都在泗灵睢周围,他们有土地在我们境内,也无力统治此间全局”,因此这些地方势力“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与各方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善于见风使舵”。对我方而言,“他们大都有实力,实力不小,如果想管理这块地方,而忽视对他们的争取,无疑会发生很大困难。这里帮

口会门多而且杂,封建派别多而且杂,大都在他们控制之下”。尽管如此,“伪、顽、匪自己内部及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给我们争取中间力量、削弱敌人以极有利条件”。^{[1]341-342}他认为对中间派的统战工作,“正确态度应当是带领朋友进步,使他们适合于发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抗日民主力量的要求。迁就他也是为了提高他,迁就还不够,还要配合以适当的批评和斗争”。^{[1]349}他进而提出:争取中间派的统战工作,当然要“看团结友军工作如何,这也就是我们交朋友的出发点”。但是主要还是要立足于“巩固现有朋友争取新的朋友,关系不大好而有可能争取的要改善关系,使他们能同我们来往”。为此应充分认识到我方争取中间派的政治优势,即“他们还无反共成见,本身或多或少有些力量,他们都有身家财产在我活动区,处在我们力量包围中,对我们不能不有些顾虑,有的和敌人有关系,但这些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他们互相之间矛盾重重,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能成为独立自主的力量”。这需要在具体工作中,一方面“对可靠朋友与不可靠朋友要分别看待,对前者要帮助他,改造他,对后者要孤立他,但又不破裂,使他在群众中愈孤立就愈能团结他”。另一方面要注意“不以胜利者自居,脚步要稳健”,做到“和人家做朋友不要暴露人家的秘密,不要天天放在口头上讲,要爱护朋友,对朋友必须批评也要很婉转,必须斗争的要采取协商的办法”。^{[1]361-363}

淮南抗日根据地也积极争取中间派的支持,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1940年3月21日,毛泽东指示刘少奇及江北新四军负责人:“肃清反共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及中间的国民党,并极力讲究作战方法,就能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5]33}

皖江抗日根据地地处日伪顽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险恶的政治军事环境促使皖江区和新四军第七师党组织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政治工作的中心线索。根据第七师对根据地各阶层政治动向的分析,“上层(包括地主、士绅)占根据地群众是极少数,一部分抗战后跑到大后方去了,留在根据地以内的半数是两面派(敌我或顽我),靠三角地区的则是三面派(敌顽我),参加我政权工作的约占十分之二,并有少数与国特有关系。中层(小地主、富农)除极少数有政治背景对我反感外,都对我表示同情,有一少部分直接帮助我们”。^{[6]137}这说明中层人士是统战工

作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上层人士在复杂政治环境下较容易动摇。

三、分化瓦解伪军伪组织及争取“两面派”

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工作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像淮北区这样面临日伪顽三方面围攻的根据地,对伪军、伪组织的统战工作显得尤其重要。比较而言,在日伪顽三股反动力量中,伪军相对来说土著色彩较浓厚。尽管与日、顽有共同的反共立场,但这种立场常常被他们与日、顽的矛盾所抵消,因而成为三股反动势力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存在着较大的和平争取空间。淮北区采取多种手段加强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工作,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通过多种途径,展开对伪军、伪组织的政治宣传攻势。当然,这种政治攻势必须辅之以军事压力,必要时根据伪军的具体反共表现,采取打拉结合的策略。

豫皖苏边区的伪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土著伪军,“领导者大部分都是地方的豪绅、退伍军人及一部分土匪、流氓、地痞等组织起来”。他们“想升官发财的和保护自家生命财产”的阶级本性,决定了“每一到利害冲突时,他们的矛盾也就愈加尖锐了”。这类土著伪军对我方“大部分都是采用两面派的态度”。其次是从东北调防来的客居伪军。他们“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因此难于联络,并且它经常轮换”,增加了我方对它争取的难度。第三部分是土匪流氓出身的伪军。一方面他们“主要是地方人,有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它善于打游击”,难以消灭,是伪军争取工作的难点。在豫皖苏边区创建时期,边区党组织对伪军的争取,首先要做到“耐心的去争取他们,特别是要有宽宏大量和仁至义尽的态度去对待他们,感化他们,才能使他们觉悟”;其次“要打击最坏的(无法争取的)一部分,采取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式”。^{[4]32-34}1942年12月28日,淮北区党委、四师政治部联合指示敌伪军工作,首先强调“干部要地方化”,要根据“周围伪军伪组织都是土生土长的地方绅士或实力派”的实际,提倡多用地方干部,“主要是与伪军伪组织有社会关系的干部”。其次要克服宗派主义,“大胆运用党外人士,利用他们的旧关系”。再次,工作重点要放在“注意争取伪军伪组织上层”上面,要敢于深入到敌占区,“要有‘不

人虎穴不得虎子’的精神,找着一定关系,到敌人据点内创造我们的据点”。最后,工作中要讲究策略,“顾及对方困难,不要操之过急,提出过高的要求”。^{[2]187}耐人寻味的是,这与“以土共对土顽”的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地方化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淮北区党和政府日益认识到争取伪军伪组织反正和起义在未来城市工作中的意义。1945年7月15日,邓子恢在边区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伪军工作的目标是为了组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攻克大城市、消灭敌人”。为此“更需要建立下层基础,使与上层相配合”。他认为应纠正过去偏重上层工作的不足,认为:“不能满足于上层分子,而应在上层掩护之下迅速建立下层基础,依靠下层的坚决勇敢来克服上层的动摇,推动上层勇气,必要时则抛弃上层,由下层直接组织起义”。同时建立下层基础,也是伪军反正后巩固和改造工作的需要,以达到“下层不致大批逃跑,同时依靠下层来推动上层进步”。但是争取上层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争取了上层分子与我拉关系,可以减少我之敌对力量,便利我集中力量去对付敌人”,以及“伪军上层人物拥有大权,通过他去号召、倡导、联络,效力更大,同时有上层工作作掩护,下层工作的进行,又得到莫大便利”。因此,应该把上层、下层工作结合起来,“依靠下层为基础,同时通过上层掩护,更开展下层活动”。^{[9]261-262}

淮南抗日根据地也积极开展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1942年颁布的敌伪军伪组织来归保护办法宣布:“只要愿来边区政府军队,均予以保护并代为介绍职业”;“来归之伪军伪组织工作人员愿意参加抗战工作者,一律以等于原来之职位任用”;“来归人员愿回家者发给路条保送回家,愿在边区做生意或种田者政府予以帮助,必要时可以借给资本”。^{[5]172}

“两面派”策略是抗日根据地党组织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工作办法。这一策略要求在我方暂时失去对某一地区的控制权的特殊情况下,如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国民党顽固派控制区的边缘区,或游击区,可以对伪军伪组织人员采取秘密工作,允许他们表面上保留日伪和国民党当局的公开身份,暗中接受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的地下工作,继续为抗战服务。这一政策的实施需要高度的政治技巧,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

统一战线工作的独创和特色。

1943年5月22日,刘瑞龙在泗灵睢县委会上指出:应认识这一地区由于“敌人控制力不强”,同时“我之力量发展亦发展不够”,而形成的“伪组织与我政权和平共居,伪组织的和平转移,成为泗灵睢政权发展的一种特殊规律”。这要求在这一地区的工作,要根据敌我力量实力对比和群众发动程度与觉悟水平区别对待。首先,“在敌伪力量薄弱,我之力量足以控制的地区,同时群众反敌伪的情绪又很高涨,应立即成立我之一面政权”,同时也允许“两面政权包围一面政权,与一面政权又包围两面政权”的特殊的个别情况。其次,“在据点附近或公路两旁敌强我弱,经常与敌伪接触之区,应建立两面派,可争取原伪组织为两面派或主动派人去做两面派,但一定要在我控制之下”,目的是“争取一般的两面派发展而为革命的两面派”。最后,“在边缘敌我顽经常进出之地区,应建立两重政权,在某种条件之下,允许伪政权或三面政权的存在”。这种情况下,我方“应独立的进行工作,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应单独地打起我政权的旗帜,扩大我之影响,发展我之力量”,切忌“与伪乡公所在一起‘合署办公’”,最后实现“在工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应及时的使两面政权局面转为我一面政权的局面”。总之,“开展新地区政权,则以军事活动、统战工作、敌伪工作及群众的合法斗争,各方面配合进行,以达到建立政权之目的”。为使两面派政权转化为一面政权,“需要军事活动,武装威胁与和平交涉、内部争取,有计划的恰当的配合去进行。总以和平转移为上策,不放弃必要的武装打击夺取”。在某些情况下,武装打击可以与和平转移配合使用,即“当和平转移发生阻碍时,则以军事为后盾;当武装打击收到实效之后,对旧的人员又应进行和平争取。这样既不过分刺激敌人,又可达到我们统治目的”。他强调:“在两重政权地区,更要以我之善政与伪方苛政对照,主动地解决群众的问题,使伪政权无事可做”,促使“群众必然抛弃伪方而拥护转变我之一面统治”。^{[1]355-356}

淮南抗日根据地在争取伪军工作中也善于利用“两面派”政策。1941年1月14日,邓子恢在路东临时参议会上做报告指出:对伪军的争取工作,要做到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政治瓦解与军事打击,两者是互相为用而不可分开的”。^{[5]92}他要求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首先要确

立“扑灭坚决汉奸与争取两面派”的方向,“对那些被迫欺骗及觉悟回头分子,或者与敌人及最坏汉奸有矛盾的人”,“争取他们成为两面派,以至进一步成为革命的两面派”。而所谓“革命的两面派”,就是“表面对敌人敷衍,而实际则替中国人做事”。其次,要把握好公开反正与隐蔽活动的尺度。因为“在今天来说,除了某些地区某些据点我们必须攻下与开辟,需要伪军反正配合以外,一般伪军工作,是不必过早反正,而且也不可能”,所以,“要隐蔽在伪军伪组织里面,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去团结伪军中一切抗日分子,使他们觉悟,一方面掌握住自己的武装,与鬼子汉奸敷衍得好,另一方面在可能条件下帮助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众,这样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到了时机成熟反攻到来,即大批反正”。^{[5]95}他要求加紧瓦解敌伪军的工作,“动摇伪军,争取伪军两面派,孤立

敌人及甘心附敌之汉奸”。^{[5]109}

综上所述,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维护国共合作的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一方面主动寻求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政治阴谋,在军事上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在争取中间派的工作中,努力实现统一战线政策和群众路线的统一。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各部门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通过多种途径,一方面展开对伪军、伪组织的政治宣传攻势,另一方面根据伪军的具体反共表现,采取打拉结合的策略。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在争取伪军工作中,成功运用了“两面派”策略这一特殊的、独创性的统一战线工作办法,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技巧。

参考文献:

- [1] 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 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 第一册(政权建设部分)[Z]. 滁州:内部资料,1985.
- [2] 淮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 淮北抗日根据地[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 [3] 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 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 第一册(武装斗争部分)[Z]. 滁州:内部资料,1985.
- [4] 中共河南省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一)[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 [5] 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 淮南抗日根据地[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
- [6] 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 皖江抗日根据地[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 [7] 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 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 第二册(武装斗争部分)[Z]. 滁州:内部资料,1985.
- [8] 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 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三辑 第二册(群众运动部分)[Z]. 宿县:内部资料,1985.
- [9] 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 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 第二册(政权建设部分)[Z]. 滁州:内部资料,1985.

A Study on United Front Policy of Hua-zh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WANG Mingqian

(Maxism School,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Hua-zhong anti-Japanese based area carried out united front policy, which pursued the cooperation with Guo-min-dang authority, on the other hand exposed their plot and strike back their military attack when they tried to destroyed united front. Based area party and government realized unite between united front policy and mass line in the process of striving for middle-of-the-roader. Based area successfully utilized double-dealer policy to strive for puppet army.

Keywords: Hua-zh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Huaibe, Huainan and Wanjiang; united front; “double-dealer” strategy

(责任编辑:陆 勇)